

做新时代『三农』事业的接续奋斗者

■ 李兴旺

爱国是一种情怀,是经过精神洗礼后的崇高价值追求。奋斗是一种志向,是经过情感认同后的自觉行动取向。面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作为新时代的农业知识分子,唯有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奋斗精神的系列论述和重要指示,脚踏实地、志存高远,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勇做新时代“三农”事业的接续奋斗者。

在新时代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就是要秉持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自觉将自我奋斗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一大批农业科教人员心怀报国理想和救国之志,积极响应“科教兴农”“兴农兴学”的口号,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充实民生与国防的伟大洪流中,切实承担起了“固国家之根本、解民生之多艰”的使命担当。抗日战争时期,西农虽地处战略大后方,但师生爱国热情高涨,以大无畏的气概,投考陆军军官学校、奔赴延安参加红军和赴缅甸国际战场参加远征军等,投笔从戎,奔赴抗战第一线,寻求抗战报国之路,血洒疆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保家卫国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学校迎来了解放,在全国革命形势向大西北进军浪潮的鼓舞下,103 名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加入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行列,成为屯垦戍边、保卫新疆、建设边疆的先锋,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突出贡献。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就是要弘扬老一辈知识分子“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的奉献精神,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不断强化“立德树人”导向,切实增强培养德智体美劳国家建设者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要永葆知识分子奋斗的精神特质,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奋斗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要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西农建校 84 年来,一代代农业科教工作者心怀社稷、情系苍生,以推进旱区农业现代化为己任,扎根西北偏僻小镇,传承“亲近农业、亲近农村、亲近农民”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工作作风,创造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农业科技成果,为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牢牢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贡献了“西农方案”和“西农智慧”。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为新时代的农业科教工作者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and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和认识,以“西部乡村类型和特征调研”落地生根为契机,切实增强服务中国梦生动实践的行动自觉。要不断强化“立德树人”导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强化“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意识,引导广大农业科教工作者脚踏实地,在服务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过程中努力实现人生价值。要紧紧抓住“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补齐农村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就是要厚植知识分子追求卓越的高贵品格,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长期以来,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以推动旱区农业现代化为己任,坚持“顶天”和“立地”相结合,奋力开拓创新,勇攀科学高峰、在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切实推动产学研转化升级,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农业现代化科技创新之路,引领旱区农业现代化阔步前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新时代的农业科教工作者,要敢于接过老一辈科学家手中的接力棒,厚植扎根西部服务国家的动力,增强学农爱农为农的定力,提升合理运用科技创新成果的能力,练就敢于吃苦、追求卓越的毅力,立足本职岗位,在坚持独创新有上下功夫,在聚焦“三农”最前沿科学问题上下功夫,牢牢抢占农业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为推动实现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过程提供更多的西农智慧。

(作者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海外视野

在传统观念中,教师以教为主,学生以学为主。这个过程中,教师拥有评价学生的天然权利。然而,自从学生评价教师兴起以来,这一评价体制越来越成为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也越来越流行,重要到了可以决定教师去留的地步。与此同时,学生评价教师这一制度本身,也一直充满了争议。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连续发表数篇文章探讨这一制度,其中的一些观点或许对我们有所启迪。

何谓学生评价教师制度

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所高校的水准与知名度。任何高校都会重视教师的教学效果,推崇卓越教学。简言之,所谓学生评价教师体制,就是一种学生评价教师及其教学水平的调查手段。可以平时进行,但一般在课程结束时开始,一学期一次。现在大都采用网上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举行。

这是学校给予学生机会,使他们可以反馈自己对教师及其过程教学、教学水平、授课质量等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以此作为学校监督教师及其教学过程的依据。这样的评价或者调查既可以让学校发现、确认优秀教师,也可以找到问题之所在,及时加以弥补。学生评价教师的评估结果大都会向任课教师开放。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中外,这样的评价对于教师来说都十分重要,既要录入教师的个人档案,更会对其去留或者晋升产生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从学生评价教师诞生以来,人们争论的焦点大都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学生有无权利、认知、水平去评价教师?学生的评价是否客观?如果学生的水平不客观,该如何处理?

学生能否评价教师

在高等学校中,对于学生能否评价教师,一般有着较为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一方认为,学生不应评价教师。首先,无论从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等方面,学生都不足以去评价一位教师的教学水平。如果要求学生一定要对教师予以评价,那么学生很可能会去关注教师这个人的诸如“待人态度”“讲授方式”等外在的形式,而忽视教师在课堂中所讲授的知识内容与教学的精华所在。其次,这样一种评价方式,对于教学的目的来说,完全属于背道而驰。让学生为教师打分和评价,教师还如何进行教学?更遑论严格要求学生了。再次,一旦出现对教师的负面评价,无论从打击教师的积极性来说,还是从教师可能消极怠工的结果来看,都将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最后,单单根据学生的评价就对教师做出无论是表彰还是惩罚,都有失公允。

在数字经济下,管理理论是否跟得上技术进步的步伐?会不会限制消费者的思辨能力?会不会形成天然垄断性,增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困难?……近日,由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办、DDI 智睿企业咨询协办的 2018 清华大学人才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在论坛上,数字经济带来的众多新议题成为论坛的焦点。

“清华大学人才发展论坛”自 2015 年开始举办,前三届论坛聚焦“国际化、创新、人文”三个关键词。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新学习时代:组织变革与人才发展”,结合新时代学习的变革,探索学习的价值及学习对组织赋能、人才发展的巨大影响和价值。

探讨人才发展之道,这势必离不开一个老话题,卓越人才的培养。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谢维和指出,从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说,卓越的含义,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评价卓越人才要做到“五不唯”,即不唯分数、不唯升学、不唯文凭、不唯论文、不唯帽子。

他解释,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注重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等能力,教授们对基础课的判断极其严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人看重实践动手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去解决实际问题,要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

“现在清华对卓越的理解,不仅仅是有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人才培养要坚持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谢维和说,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特别是信息社会,创新是卓越人才最重要的含义之一,卓越人才的创新素养应包括想象力、建构力、解释力等方面。

企业转型应围绕数字化作出变革,且文化与人才先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对文化与人才又应该有哪些要求呢?

DDI 智睿企业咨询华北区董事总经理朱彦昌指出,数字化转型下的未来企业所倡导的文化,是自驱、敏捷、合作、创新、跨界、开放、包容、学习的文化。在数字化时代下,企业需要的不是领导人才,而是更多的领导力。人人都需要领导力,企业才会在转型变革中获得最终成功。

“许多企业都认识到领导力对企业转型的重要性,但如何在转型中加速人才发展,是企业目前最重视的议题。”DDI 智睿企业咨询副总裁布鲁斯·瓦特补充道。在 DDI《全球领导力展望》中,他

域外传真

对于很多大学领导来说,那些喜欢提出不同意见、喜欢辩论的员工可能会让他们倍感头疼。但是,企业家、作家玛格丽特·赫弗南则强调,大学领导应该学会包容这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冲突”。特别是在经历过去年英国高校教师因退休金问题罢工,导致学校停课的事件后,这一点就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赫弗南来说,论辩和冲突实际上代表着人们对于某个问题或事件的关注,这远比死一般的寂靜和一味的言听计从要好得多。她表示,如果自己是高校的高层管理者,所管理的地方没有“麻烦制造者”,这会让她感到十分不安。

赫弗南加入 Advance HE (一个致力于帮助高等教育进行分析、塑形未来的机构组织)后,她建议高校领导要在如何建立起健康的工作文化和环境上下功夫。她通过研究发现,在欧洲和美国,高达 85% 的人对工作环境中的问题沉默以对,一是害怕提出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二是因为他们相信,即便将问题说出来,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一定的“冲突”应该被看作是大学工作



图片来源:麦可思研究

另一方则认为,学生评价教师乃情理之中。首先,学生作为教师的受众,拥有天然的评价教师的权利与义务;其次,有人甚至把学生视为顾客或者消费者,认为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顾客或消费者,当然有权利对出售(传授)知识的售货员(教师)说三道四,评头品足;再次,大学生作为成年人,具备了评价他人的认知水准,也应该相信他们具有客观公正的道德意识;同时,现在的问卷调查,也会尽量彰显客观公正的一面;最后,学生的问卷调查可以成为学校评价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环节,因为凡是无法获得学生认可的教师,一定不是好教师。

由此可见,上述两种观点立场各异,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双方很难说服对方。但在双方的角逐中,被评价的对象——教师被拉上讲坛评头品足,则是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说,最受“损害”的无疑是教师。

11 月 27 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刊登了一篇教师回忆文章,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人文学科索休教授邦基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学生评价教师,不仅伤害了老师,也伤害了学生”。

学生评价教师,最终“害”了学生

邦基从有关学者对学生评教的研究成果谈

数字化时代,人才需要升级哪些能力

■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发现,所有 CEO 都意识到人才发展很重要,但很多企业都没有有效的领导力战略,以支持人才与领导力发展。

“我们要从商业挑战出发,精准识别出哪些领导力是解决组织未来挑战的重要要素。所有的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速度,如何加快转型过程,确保足够质与量的数字化领导人才是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最重要力量。”在布鲁斯·瓦特看来,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必须从内部和外部同时发现和培养领导者,且扩大人才发展的群体。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朱恒源强调,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下,组织敏捷性的核心是让每个组织内的员工都有战略意识,让员工在业务节奏中思考战略,同时在战略迭代中发展组织能力。“一个敏捷的组织,应让一线员工、中层经理都能理解战略,知道未来发展方向,从而具有战略内生能力。”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余吉安从多维度分析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人才需求”。他指出,中国当前在第一、二、三产业内数字经济的渗透已非常明显。“在数字经济时代,高素质人才培养需求就显得极为明显。将来更多的人既要有数字基础,同时又要熟悉商业,对跨界的要求越来越高。”

多人

邦基认为,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教师对学生所提出的标准在降低,学生所学的知识自然而然也在减少,而他们为高等教育所支付的费用还在上升之中。邦基说,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的学校都把学生当作顾客或者消费者,因此都全力以赴地要让学生感到幸福与快乐。如此一来,学生的学习能力下降,知识储备不足,连带的一切环环相扣,也就都不能尽如人意。由此他认为,这无疑是“害”了学生。

有意思的是,邦基回顾了自己初入学术界时的一段黑色遭遇,因为自己严格要求学生而被打了很低的分数,他为此感到耻辱。这样的一段“悲惨”经历,在他的脑海中盘旋迁移了 50 余年!

环境、文化健康的象征,因为它能够促使领导进行必要的思考。

除此之外,高校在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为高校领导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结果和问题。高等教育中各类竞争也愈演愈烈。学生们为了空间和分数竞争;学者为了工作、发表刊物、资金竞争。无论处于何时何地,人们都在被衡量、被排名。将大学体系放在竞争压力的五指山下,导致了一些“扭曲”行为的产生,比如学生抄袭作弊,学者学术造假。然而对于这些问题,大学领导往往不得要领,难以对症下药。

在赫弗南看来,一味地用竞争和排名去衡量事物是不正确的。但是大学领导往往在不经意间会去关注排名、关注取得了何种外在的成绩或价值,以此来定义成功,而不是根据自身情况为成功定义。

为了使学校更具创新能力,建立起良好的工作环境,校长应当重新思考对于竞争和排名的态度,思考如何使大学不再成为排名的奴隶;思考为什么很



图片来源:全景网

接下来,他以个人在欧洲教学的经历告诉读者,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学生评价教师的制度。邦基说,欧洲的高等教育制度也有很多问题,但学生抱怨教师则不在其列。他通过自己在维也纳大学以及比利时、德国高校任教的经历说明,学生在课堂上全力以赴地认真听课,使这位经常会担心被学生评估的美国教授深受触动。他后来发现,学生上课越是集中精力,自己也会更加富有热情地专注于教学。这样的效果自然也会令人满意。

谁可以评价教师

邦基自然也认为,教师的教学应该有人来评价。那么,谁有资格、权利与水平,可以评价教师呢?在他看来,应该是高校的行政管理者,而不是由学生承担起这样纷繁复杂的评价工作。唯有他们才能真正评价一堂课的优秀。

但我以为,任何一项单一的考查手段,都难以承担起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责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在的教师评价体系大体上是由院系领导、职称晋升委员会组成。他们会充分考虑学生的评价结果,来决定一位申请者是否是“优秀教师”,甚至要最终决定这位申请者的去留。像这样的方法与措施,虽然不乏科学性合理性,但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当有两位申请者其他相近时,那么,学生评价可能就会发生巨大的作用。而落选者很有可能是一位平时严格要求的好教师,而上位者则可能是一位愿意给学生更高分数的不怎么好的教师。

除了上述方法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加以引用。比如,如何引进货真价实的“同行评议”就值得我们重视。在美国的顶尖大学,对于升任教授的申请者,相关院系需要搜集同级别高校的 10~15 位甚至更多专家的真实反馈意见,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一般来说,这样的同行评议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让学术界与相同研究领域中的同行发挥真正的作用,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改革举措。

无论是评教,还是确定教师的去留与晋升与否,任何单一的措施都可能失之偏颇。正如精神分析学家马斯洛所说,如果你手中有锤子,那么你看到的所有问题都只是钉子。世事如此,高校学生评教的举措,也概莫能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记者快评

3 天前,第 31 届世界艾滋病日刚刚过去。可喜的是,相较于往年,今年的艾滋病日前夕,防艾宣传的数量、形式比往年更加丰富。忧伤的是,与往年相同,艾滋病日一过,大面积的宣传便立刻偃旗息鼓。

就像“三月雷锋来,四月雷锋走”的逻辑一样,仔细琢磨,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防艾教育常态化受到挑战。

如果仅靠艾滋病日的宣传,或其他场合下的泛泛而谈,人们是否仍然会谈艾色变?答案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会对艾滋病感染者“敬而远之”。因此,对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不能总是浮于表面,不能只在一个固定的节点,而是应该由表及里、持续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实,性传播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染渠道之一。然而怎样切断这一渠道,并不是简单口号召青年男女恭敬,而是要勇于对不明真相者讲解。总是刻意回避,念叨着“性行为不安全,不要轻易尝试”,很难做到知行合一。

开课或是一种更系统、更规范的形式,它可以像解剖洋葱一样,与学生们细说原理与细节,在与学生的讨论中,让他们学会正确选择。不久前,麦可思的调查显示,超九成大学生认为有必要进行性知识教育。然而,目前高校开设性教育课程的情况并不乐观,65% 的调查者反映并未开设相关课程。

未开课的原因有种种。“《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学校的健康教育,但重点在于中小学,并没有把大学考虑进去。政策上的忽视,使得课程变为了“自选动作”。更主要的,是高校自身包括教师、学生并没有意识到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必要性,且认为艾滋病离高校很远。而事实上,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国新发现的 15~24 岁青年学生 HIV/AIDS 病例,从 2008 年的 482 例上升到 2017 年的 3077 例,感染者以男生为主,80% 以上通过同性行为感染。

比感染艾滋病更恐怖的是选择性忽视。正因为这种忽视,一些艾滋病感染者不被理解、备受歧视,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才有了不久之前,男子炫耀传染大学生艾滋病所引起的全民愤慨。因此,师资不具备、无法吸引学生上课、有其他的替代形式,都不能成为高校逃避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借口。

防艾教育应实现常态化

■ 温才妃